

大家谈人生

福州终年为榕荫所覆盖,故又称榕城,遍地飘满花香果香。闽江缓缓流过市中心,在著名的马尾港,那里奔涌着东海的浪花。福州确是福地,苍天福佑,而我却有点生不逢时。1932年元月,我出生在号称“有福之州”的这座城市。5岁应当是开始记忆之年,从那时候起,伴随我长大的,就是来自遥远北方的枪炮声和哭喊声,是那些国土沦丧的哀歌,是街头随处可见的饿殍和伤兵。忧患催我早熟。苦难,装扮了我的童年。

五四运动我虽然没有赶上,但我有幸长期生活在北京大学这个“五四的摇篮”,我接受了那一代人的精神“遗传”;强国新民,救亡图存。我的老师中就有杨晦先生这样当年勇猛冲锋的人物,还有诗人、作家和学者。而五四之后发生的一切,我都是或近或远、或深或浅的亲历者。我拥有了时代的艰辛和苦难,也拥有了时代的多彩和新生。我是富有的,也是幸运的。

我的人生理想

我的童年和少年与苦难为邻。贫穷、饥饿,以及随时可能辍学的危机,使我幼小的内心有着反抗黑暗和追求光明的愿景。在彷徨和苦闷时,从书籍和传闻中,我听到了“山那边有个好地方”的歌声,那是我所向往的自由、平等的生存境界。17岁时,我参加了迎接新社会的雄伟的行列,把生命投入到为光明和理想的奋斗之中。我把艰难的岁月留在了身后。最近几年,我有机会重返母校三一学校(现在的福州外国语学校),校方找出了一份我当时的登记表。表中的问题:我的人生理想?我填写了5个字:为社会服务。

人到暮年,知事多了,往往冷静自问,我们忙碌一生,历尽艰辛,所为者何? 东方相信轮回,西方相信天国,我都不是。我知道,财富,地位,头衔,到头都是空的。陆游讲,死去元知万事空,他有他的彻悟,但他还有家国之忧,这是我所认同的。人的一生很短暂,学人生,学知识,学事业,为后代,艰苦打拼,千辛万苦。我常慨叹那些知识者和大人物的逝去,为之叹惋,积学终生,来去何其



在甘肃会宁,天空记得,当年红军的旗帜从这里飘过;大山记得,红军的草鞋从这里走过。

如今,这里有一座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仿佛厚重的大书,记录了那段风云激荡的峥嵘岁月。走进这里,中国革命的千山万水就会展现在我们面前。

这是一张红军党员登记表,是红军会宁会师期间遗留在县城周家大院里的。周大妈虽然不识字,但她认为这写字的纸一定很重要,于是把它剪成枕头样子,保存在绣花枕头套里,直到1996年,她的儿子把它交给了纪念馆。在这张发脆的麻纸上,我看到这样的记录:党员李道存,年龄十九岁,籍贯黄安县,家里五人吃饭,自田没有,自地四升,佃田四斗,自屋一间半,欠债一百廿申,1930年在新集自动来红军……

这是一张明清时期的文庙供桌。红军会师联欢大会上,朱德总司令在会宁县城的文庙大成殿里站在这张供桌前,向红军将士发表了讲话;也是在这张供桌前,宣读了党中央为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发来的贺电。

在这些革命文物中,一把保存完好的小军号,讲述的是“红军李”与“小军号”的故事。“红军李”是17岁的红军司号员李克玉。红军离开会宁时,他被安排在中川乡一户无儿无女的老夫妇家里养伤,每晚睡觉,他都把军号搂在怀里。上世纪60年代,“红军李”当上了生产队队长,每天上工前他就吹响这把军号。如今,每一个走近它的人,都能听见自己的血液里,响着冲锋的号声。

这是一盏马灯。一次次擦去灯罩上的尘埃,就像擦去当年的黑暗,灯就又一次次亮了。我仿佛看见那些提灯赶路的人们,正集合在一盏马灯下,又一次出发。

这是一口行军锅。我想问,这口锅被背着走过了多少路? 我想问,那么多的日子

匆匆!

我常反观自身,平常,甚至渺小,微不足道。活着意义是什么? 记得当年,我读《大众哲学》,读社会发展史,也读《改造我们的学习》,有了“为人民”的觉悟。这答案遥遥地接续了那张初中入学的登记表的填写:为社会,为人民,做好事,尽一切可能助人。我曾用第三人称立下誓言:“为了做一个真实的人,他为此苦斗了一生。”

生命因诗歌而丰富

初识字,我便开始读五四新文学,冰心教我爱,巴金教我抗争,鲁迅教我静默中呐喊。大先生的文章深刻难懂,慢慢也就读懂了,我于是有了新的觉醒。后来,到了北大,有机会接触当年的学术大师,北大教我治学的要领,我于是开始知晓人类的文明史,特别是系统地学习了中国的文学经典。文学神奇地抚慰了我曾经受伤的心灵。

也就是这时,诗歌走进了我的生活。杨柳依依,雨雪霏霏,大漠孤烟,春江花月。我为古代那些优美的心情所感动。在那些贫穷而愁苦的日子里,诗歌给我带来了丰盈和愉悦。小学春游,我出不起费用,为忘悲感,把自己关在房中读诗。那时似懂非懂地背诵了《长恨歌》和《琵琶行》,诗歌抚慰了我的心灵,我开始与诗结缘。岁月严酷,内心悲怆,“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在陷于危境时,诗歌给了我生活的勇气。我在寒夜里悄悄写诗,我开始热爱诗歌,现代的和古代的,东方的和西方的,我为这神奇的文体而迷狂。

一生只做一件事

人在年轻时容易轻狂,自信力大无边,可以做许多事,其实未必。我当过兵,上过学,也下过乡,少年壮志,踌躇满志。我崇拜王国维,也心仪闻一多,他们生命短暂,却创造了和登上了学术的高峰!而我只能是个平常人做平常事。记得当年,《诗刊》主编臧克家有了奇想,让大学生来编写中国新诗史。

里,一口空空的锅,是否也感到饥饿? 我想问,一口锅能否在炮火里煮熟野菜? 火红的血,是不是也叫火? 我想问,今天面对这口锅的人们,是否会想起自己的一日三餐?

这是一件羊皮袄。正穿着,就会融入一座雪山;反着穿,就和土地一个颜色;而没有了毛的羊皮袄,是一件铠甲,穿着它的人,走过了枪林弹雨。

面对一只羊皮水囊,我想起那支喉咙冒烟的队伍,当年他们的嘴唇裂出了血。是善良的人们给他们水喝。如今,谁走在会宁,如果感到口渴,轻轻摇晃这只水囊,仿佛还能听到里面的水声。

在这里,我还看到了一张借条。是证明,也是承诺。借了几斗谷子给红军的老人,保存下了这张借条。谷子早都还了,可借条还在。他的后代,把它交给了纪念馆。依然是证明,依然是承诺。

这是一把手枪。是的,握过枪的人,正在纪念馆墙上的照片里望着我们,我们望着枪。它当年的每一次闪光和呼啸,都已融入灿烂的曙光。

这是一双草鞋,走过雪山、草地、荆棘、泥泞,走过血与火。转过身来,我仿佛听见,草鞋依然走在大地上的声音。

这是一张布满裂纹的旧地图,有的地方已经破碎。为了修补它,几根红色的线,在山河间一针针穿梭。每一根红线都是民族的血脉,每一个红色的箭头都锐不可当,都指向战斗。在这张地图上,我找到了扎西、遵义、懋功、两河口、毛儿盖、俄界、榜罗,找到了湘江、乌江、赤水河、金沙江、大渡河、腊子口、直罗镇,找到了雪山、草地,找到了会宁……

我从小生活在崇拜英雄的年代,是听着英雄的故事长大的。“长征是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在耳畔回响了几十年。一唱起《长征组歌》,就心潮澎湃。心里,先烈们的热血依然在泥土里滚烫;头顶,红色的旗帜一直在风中啦啦啦啦地飘扬。

从纪念馆出来时,我在想,如果我出生在那个年代,我也一定会去参加红军,参加长征,为革命爬雪山过草地。一个从纪念馆出来的人,一定在情感上多了一段经历,看看高远的天空,看看脚下的道路,目光里就多了坚定。

生在有福之州

谢冕

徐迟、沙鸥、丁力亲自过访我的北大宿舍,我约了5位同学:孙玉石、孙绍振、殷晋培、洪子诚和刘登翰,响应克家先生的重托,过了个当年时兴的革命化的春节,写出了后来定名的《新诗发展概况》。年轻懵懂,水平低,观点偏,不足道。我们6人分别完成了初稿,共计7篇,但只登了4篇。诗刊社没有解释,我们也不好问。也许是当年的情势有点紧张,只能不了了之。

但却就此把我们6人推入了诗歌研究的领域。6个人,一个小组,诗刊社借给我们和平里一套空置的家属房,我们自生炉火,一日两餐,分头阅读,集体讨论,一辆面包车运来了北大图书馆的所有新诗资料,加上诗刊社和北图的存书,我们用一个寒假如饥似渴地阅读了五四以来的几乎全部的中国新诗的典籍。我们获得的是课堂学不到的知识,这种集体阅读和讨论催我们成熟,滋养我们一生。

同学少年,如鱼得水,一发而不可收。6人中,最年小的殷晋培不幸英年早逝,其余5人,从此不约而同地痴迷于诗歌研究,各自做出了成绩,此乃后话。这里我要郑重地感谢克家先生和徐迟先生,由于他们当年的信任,才有了我们的进步和成熟。克家先生对我支持朦胧诗有意见,他批评我的“多变”,我不辩解,我知道老先生有他的执念。

做一名诗歌义工

我在大学的工作是文学研究,具体一些,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讲课,带学生,写书,编刊物,开学术会议,等等。在繁杂的教学生涯中,我用力最多,也最上心的工作是当代诗歌。比起当年的那些同学,他们著作等身,成为学术大家,我是最不用功的一个。但我也有长处,有热情,办事、治学也专注,自勉,也告知后学,不知不言,不发空论。我认定自己非天才,但我勤奋。

在中国新诗领域,因为我读得多而广,积累也深,获得了一定的发言权。我只在这方面自信,其余一切,例如外国文学、中国经典,凡我缺乏下功夫的,绝不轻言。我在中国诗歌界广结善缘,与人为善,编书,出版,



▲中国画《棕树小鸟》，作者江寒汀，中国美术馆藏。

西海固所见

卢山

电力风车如群山长出来的手掌
在为远道而来的人导航
羊群穿过白杨树,闯入腾格里沙漠
找寻一条失踪的河流

在宁夏川,曾被风沙蒙住面孔的人
与我互相辨认。群山和雪豹无声
大地的坚忍和静默,让人肃然起敬
四处汲水的落日一头扎进黄河

参会,写序,为推介新人,尽心尽力。一个“批评家周末”,我做了10年,直到退休;一套“20世纪文学总系”,我带头写第一部《1898:百年忧患》,这套书,现在还在重印;一本《诗探索》,中国新诗理论批评“第一刊”,无刊号,无经费,无报酬,所有的人员都是自掏腰包,一直坚持到今天。直到我退休,把担子交给了吴思敬和林森他们,我依然是终身制的诗歌义工。

我说一生只做一件事,严家炎先生不同意,他说我还做了不少事。但我自知,我用心最多的还是诗歌,中国诗,外国诗,在中国诗的领域,我只做现代新诗。我以能为诗歌无偿劳动为荣。在北大,我参与建立了中国新诗研究所,后来,在周其凤校长等人的支持下,成立了北大中国诗歌研究院,建立了采薇阁——那招牌至今还挂在朗润园的一座四合院外墙上。我以诗歌研究院的名义,在北大召开了纪念新诗百年的庆典活动,出版了相关的纪念文献。我的新诗研究没有止步,中国诗歌的新旧体诗的“百年和解”是我近年提出的,得到了业界的认可。

诗酒年华依旧

我一生都在学鲁迅,奉他为人生和学术的导师。但鲁迅的“不宽恕”我没有学到。我的人生态度就是远离不可交的人,“人不知而不愠”,我不善辩,也不喜辩。知人论世,喜欢换位思考。

不知不觉,已退休好久了。前几年,90岁时,雪后滑倒,做了换骨手术。而后,重新站立,重新学步,重新登楼,自谓“失足”。康复中,手书,成都友人转为电子版传送,再后,才是回到家里电脑写作,有“失足三记”问世,坊间传为美谈。而我依然羞愧,我因自己的不慎而让家人和朋友为我牵挂、受惊,对不起了。那年摔倒后,手术及时,医生高明,恢复良好。手术之时,俄乌烽烟初起,如今我已康复,而战烟至今未绝。

感谢医生、家人、朋友、学生的一路相携相助。我虽已九十多高龄,而晨练依旧,社交依旧,诗酒年华依旧,为世界和平、人类友爱祝祷依旧。

合上《以身许国酬华年:杜祥琬传》一书的最后一页,窗外已是暮色四合。

我的眼前又浮现出2025年5月17日那天下午,我在北京采访杜祥琬先生时的情景。当时杜老已经87岁了,但精神矍铄,思维敏捷,眼角的皱纹里蕴藏着岁月沉淀后的温和。我们交谈了一个下午,他的心里装着无数的故事和智慧,也让我深深感受到一位大科学家的人格魅力。

如今这部30万字的传记已经由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它浓缩了这位战略科学家波澜壮阔的一生。作为这部传记的作者,我也仿佛刚刚经历了一场漫长而深沉的精神洗礼。杜祥琬先生就像一块历经岁月打磨的璞玉,静静地散发着温润而坚韧的光芒。这光芒,照见了

他作为知识分子的人格底色,也照见了我们这个时代最宝贵的文化传承。

《左传》有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古人将“三立”视为人生的不朽。在杜祥琬身上,我看到的正是这种跨越千年的文化回响。他生于抗战的颠沛流离中,长于革命知识分子家庭的熏陶下。父亲为了党的事业,长期隐姓埋名,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在隐蔽战线上坚守;母亲在“文革”中蒙冤离世,但他将悲痛深埋心底,化作了对国家更为纯粹的赤诚。这种在苦难中淬炼出的宽厚与自律,便是他最深沉的“立德”。他不以院士自矜,谦谦君子,温润如玉。

如果说“立德”是树之主干,那么“立功”便是他结出的时代硕果。我曾无数次在字里行间咀嚼他那句朴实无华的话:“我们这一代人,国家需要什么,我们就学什么,做什么。后来成了国家需要的一个。”这是何等通透的觉悟!

在梳理他的人生脉络时,一个细节让我动容。1956年,18岁的杜祥琬高中毕业,他原本的梦想是报考南京大学天文系,去探索浩瀚宇宙的奥秘。然而,命运给了他另一个选择——他被选拔为留苏预备生,国家需要他学习核物理。一边是心之所向的星辰大海,一边是国家急需的原子核微观世界。杜祥琬没有片刻犹豫,他放下了天文学理想,选择了核物理。他做到了,并且成为一名著名核物理科学家。

留苏毕业回国后,在王淦昌、邓稼先麾下参与氢弹研制,成为中国核武器中子物理学与核试验诊断理论的权威。按常理,在这个领域功成名就,安享晚年已是顺理成章。然而,杜祥琬并没有躺在功劳簿上。古稀之年,他却转身投入能源战略与气候变化研究。从“核”到“能”,从国防尖端到民生大计,这不仅仅是专业的跨越,更是心力的跨越。为了搞懂能源转型,他像小学生一样从头学起,调研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他担任国家能源咨询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为中国能源的可持续发展奔走呼号;他作为气候宣传大使,在全球舞台上发出中国的声音。这种不给自己设限、永远在路上的姿态,是对当下社会中那种“躺平”心态、那些害怕走出舒适区现象的最好的回应。他用行动告诉我们:真正的科学家,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永远在路上。

在撰写这部传记时,我的脑海中总会浮现出我所写的另一部传记里的主人翁——朱光亚的身影。朱光亚比杜祥琬年长,曾是他的上级与师长。在朱光亚的身上,同样流淌着这种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血脉。无论是统筹全局、低调内敛的“众帅之帅”风范,还是“不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决绝,杜祥琬都与他一脉相承。他们都在用最纯粹的人格,书写着“爱国”两个字最厚重的注释。

时代的巨轮滚滚向前。去仰望精神,去追寻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这是中国科协推出“科学家精神和科学文化出版工程”的意义,也是我极其愿意用几年的时间为科学家作传的功力。因为,社会永远需要像杜祥琬、朱光亚这样的精神坐标。

我们今天呼唤传承科学家精神,传承的不仅仅是某项技术的突破,更是这种“立德、立功、立言”的文化底蕴,是这种将个人荣辱置之度外、将家国天下扛在肩上的大我境界。愿我们在追逐星辰大海的征途中,不忘回望来路。因为,只有当无数个体的微光汇聚成炬,一个民族的精神脊梁,才能永远挺拔。

杨大夫,专程前来病房巡查问诊。他是位眉眼温和的中年人,白大褂整洁清爽,脸上虽藏着掩不住的疲惫,待人却耐心从容。他俯身细致查看父亲的术前状态,柔声安抚老人的紧张情绪,又条理清晰地讲解手术流程、风险预案,一点点抚平了我紧绷的情绪。待他叮嘱完毕准备转身离开时,我见病房里并无外人,便取出提前准备好的信封,快步上前拦住了他,躬身恳切说道:“杨大夫,我父亲年纪大,手术风险高,辛苦您多费心,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恳请您收下。”

我以为这是成年人间稳妥的礼数,可杨大夫没有丝毫犹豫,轻轻抬手,稳稳挡回了

我递过去的信封。他目光澄澈坦荡,语气温和诚恳:“救死扶伤是我的本分。放心,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完成这场手术。”话音落下,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轻掩房门离去。

次日,父亲的手术十分顺利。转入恢复期后,杨大夫每日按时查房,细致叮嘱饮食调理、翻身护理、伤口换药等各类养护细节,事事尽心、处处用心。

我们身处繁杂的人情社会,被世俗规则慢慢同化,习惯了用功利衡量善意,用世故揣测人心,可这场病房里的不期而遇,扭转了我的固有认知。

夜色渐沉,医院褪去白日喧嚣,病房灯光柔和静谧。卸下病痛折磨的父亲,眉眼舒展,呼吸平缓,已然恬然入梦。岁月静好,温暖人心。

本版邮箱: dadi@peopledaily.cn
本版责编: 程 红
欢迎广大读者来稿。来稿要求为原创首发,非一稿多投。